

草原帝国

[法]勒尼·格鲁塞 著

魏英邦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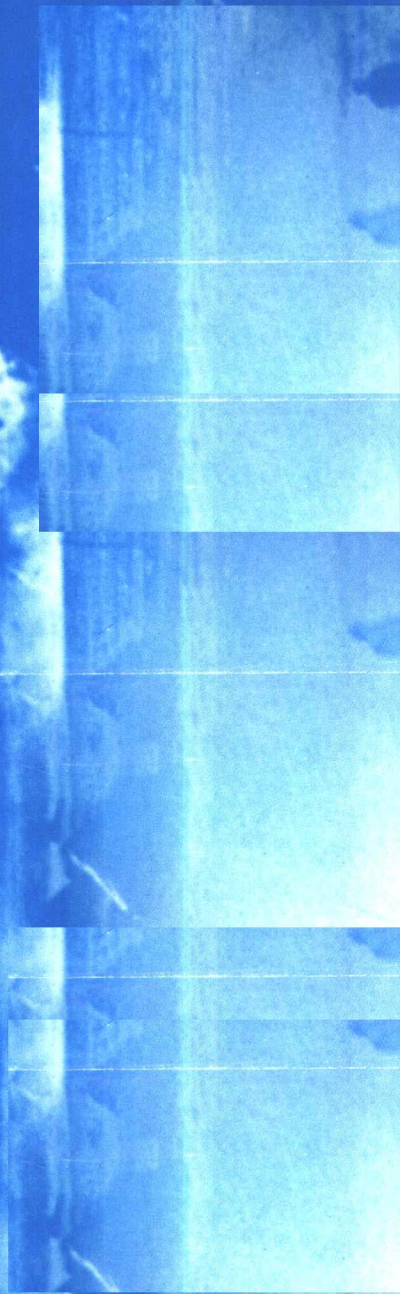


草原帝国

[法]勒尼·格鲁塞 著

魏英邦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草原帝国

〔法〕勒尼·格鲁塞 著

魏英邦 译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3 插页：18 字数：515,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 501—7 500

ISBN 7-225-01276-2/K·98 定价：34.80元

RENÉ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ATTILA, GENGIS-KHAN, TAMERLAN

PAYOT, PALIS

1939

译 者 简 介

魏英邦（1913—1991年），青海湟源县人，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哲学系。1934年公费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因二战滞留法国，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仍潜心学术，先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回国，先后任职于北京翻译局、中央民院和宁夏大学，1976年退休后返回西宁。魏英邦在巴黎时曾听过格鲁塞讲授的《远东史》课。60年代，他以对老师的崇敬心情，几度寒暑，译出了格鲁塞的重要著作《草原帝国》。

《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弁言

西北五省（区）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据黄河、长江之上源，自古以来为华夏诸族文明之发祥地、多民族蕃衍生息汇合交融之舞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通道，凡有志于研究中国史地学者，披览典籍，莫不关系西北一隅。但《隋书》、《旧唐书》等经籍艺文志著录有关史传地志行记，为数不多，宋元明各代，专著稍增，亦均散佚过半，降及清代乾隆以后，西北史地之撰作辑佚，记今考古，始大行于世，徐松、龚自珍等先后倡留心边陲之学风，遂奠定西北专门之学之基础，自兹以还，此学时有升沉。清末国势衰颓，外国势力渗入西北，考察山川、搜讨文献者接踵而来，饱载而去，有识之士，时时为之扼腕叹息。三十年代，关心邦国之乡贤学者或辑录史志或实地考察，抗日战争起，多士来居关中陇右，以故一时调查西北后方实况，蔚然成风，而陕西北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之根据地，自此出发遂能光复故土，解放全国。解放三十五年来，西北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学人研究乡土故实，著述日多，西北史地之学又值一复兴之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区）出版社遂于1984年决定协作出版《西北史地资料丛书》、《西北史地资料译丛》，以汇集、整理自古迄清记录西北历史地理之典籍，兼及组织翻译国外有关著述为己任，使学

者有研讨之资，省寻觅之力，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1983年中央决定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国家建设重点转移到西北。近十几年是倾注大力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阶段。在物质准备之外，人才培育与科学调查实为当务之急。西北史地的研究与知识的普及既是培育热爱西北、献身开拓的英才所必需，又是调查西北自然社会现状的凭借，因此，《西北史地资料丛书》、《西北史地资料译丛》的出版不仅适时，而且其重要意义又超轶于裨益专门学术领域之外了。

此丛书的选编校注出版的牵头单位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受编辑同志再三重嘱，聊作弁言数语如上。

翁独健

一九八四年十月

译 者 之 言

我们先介绍原著者的简历，然后谈本书内容，以及与本书第二章有关的西方史料和专门研究。

勒尼·格鲁塞（1885—1952）教授为现代法国研究亚洲史学界的泰斗，生平著述甚富。就译者所知，他于1921—1922年时即出版了一部巨著《亚洲史》；于1929年发表《远东史》，获得法国铭文学院的茹理安奖金。该书中的蒙古帝国史部分已由冯承钧氏译成汉文（《蒙古史略》1933年）；同年，又发表《在佛陀的遗迹上》一书，受到法兰西学院的褒奖。1929—1930年，他出版《东方文明史》包括近东、印度、中国、中亚细亚与日本，次年，该书即被菲利普斯译成英文。1931年，他的《印度诸派哲学》问世。1936年，他出版《十字军战争史》获得法兰西学院与法国铭文学院的两种奖金。《草原帝国》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于1939年出版，在作者去世后已再版了两次；1946年，该书被日本蒙古史学者俊藤十三雄译成日文《亚细亚游牧民族史》。1941年，他的《蒙古帝国史》出版，书内叙述历史是自成吉思汗的先世至忽必烈于1294年死时为止，这是一部归纳了东西方史料的杰作，读者们对它期待已经很久了。1951年，在作者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完成了《中国和它的艺术》一书，书内充满对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的赞扬和推崇。

此外，格鲁塞教授写过几种通俗化的小册子，如《亚洲与历史》和一些短篇论文与书评。除从事于东方历史著作外，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亦不遗余力。在法国出版的几种艺术史丛书内常有其论文或序言。在他的晚年，他主持出版了彩色影印的东方古画选集数册。

他是法国巴黎东方文物馆的馆长，鲁佛皇宫学校与东方语言学校的历史教授，亚洲学会的秘书长；在1946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此外，他还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作家协会，以及英、比、荷、瑞士等国的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顾问、理事等职。

我们介绍这部法国资产阶级东方史学家格鲁塞的作品，目的在于明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高原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与动向。至于作者的史学观点及其对原始史料与历史人物和事变的评价则并非我们所同意的。作者完成这部著作前曾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参考了不少的史料和专门研究。他综合地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与东方学方面的最新的成就。因此，使人感到他这部著作在题材上很新颖，在内容上很丰富，是一部西方近几十年来在突厥——蒙古民族史学方面研究的总结。

顾名思义《草原帝国》是一部古代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全书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与王朝为纲，将它们的兴亡以纪事本末体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读者。史实是繁多的，因为这部通史所涉及的空间甚广，从日本海到法国中部，时间甚长，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后18世纪中叶。作者还在《草原帝国》的大标题下提出三个英雄人物：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

儿。成吉思汗是我们熟知的，但阿提拉是个古代汉文史书上不曾有过的名字；至于帖木儿他曾与明朝于1387—1405年间有过外交使节上的来往，但《明史》对他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和他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则一无所知。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只不过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以外建立了大帝国的代表，其只在草原上东奔西驰，南征北战，思图摹仿他们的行为的人物何止数十百人。格鲁塞对这三个大帝国的创立者作了详细的传记，但对其他在草原上建立王国的好汉们也并不忽略地一一叙述了他们的来历，分析了他们的所以失败和成功的原因。作者反对个人崇拜，他认为这些创建伟大帝国的人物，或者只称霸于一方的酋长们，都不过是时代和环境的产儿。作者甚至是个机械唯物论者，他说游牧民族的迁徙、远征、侵略邻国，都是受制于“自然法则”的结果。

全书共分三章，在比例上很不均匀。第一章阐述第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以迄公元后第12世纪，二千多年的历史只占原书212页。第二章的内容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即一般所谓蒙古帝国史，它占原书303页，约当全书的一大半，但所叙述的历史则只有三四百年，自12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第三章是写从16世纪初至1759年间的历史，只占原书85页。所以，蒙古帝国史在全书中占了重要的位置。这并不奇怪，因为威慑过欧亚二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今日史学界仍被看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对象，它牵涉的范围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帝国为广。

西方史学界的蒙古帝国史学还在发展之中，它不似中国元史学的那样狭隘，元史学只不过是蒙古帝国史学的一小部分。当然，蒙古帝国史又和蒙古民族史不同，而蒙古民族又有广义与

狭义之分，广义的蒙古民族是指在历史上所有“鞑靼”民族，它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诸部落民族；狭义的蒙古民族则只指围绕着戈壁大沙漠，从阿尔泰山到黑龙江流域间讲说蒙古语的民族。事实上，民族也不过是一种历史范畴，它并非永恒不变的，它的构成因素、血统、语言、信仰、生活方式等，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蒙古帝国内各汗国的上层构成分子不只是真正的蒙古人，他们可统名之谓突厥——蒙古人，而且后期蒙古帝国的创立者帖木儿，已是个纯粹的突厥人。

《草原帝国》是世界通史性的，它不拘于一国，也不限于一个民族。一般通史要叙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在《草原帝国》内有较多的篇幅在记载王朝的更迭，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封建领主们互相厮杀和循环报复等。在经济方面，作者重点地分析游牧人民的共同性，说他们与邻居农业国家的关系主要不是表现在和平时期的交易，而是在战争时期的掠夺。在论述文化方面，作者的见解是新颖的。他的草原艺术论将里海沿岸的斯基泰艺术与河套的鄂尔多斯艺术联接起来，以说明古代草原文化的同一性。他强调希腊文明在中亚细亚的影响，他证实景教、佛教与伊斯兰教先后在中亚细亚建立过教会区。他还特别提到蒙古帝国对开辟欧亚孔道和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这是一部研究蒙古帝国史学者们所必需的参考书。在内容上它比多桑与霍渥尔的书丰富和完备，它不似多桑的书仅局限于伊儿汗国和霍渥尔的书仅完成了蒙古帝国史的一部。格鲁塞利用了多桑与霍渥尔所没有见到的新发现的史料和现代东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草原帝国》并不是一部断代的蒙古帝国史，它是一部亚

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在它以前，已有过类似的著作，例如巴克尔的《鞑靼千年史》（伦敦，1895年版，向达等译，1937年版）和德格涅的《中国北方各族即自公元前至今日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巴黎，1756年版），但和《草原帝国》比较一下则不只显得它们的陈旧，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方面也是相形见绌。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一点，即这部书的内容有许多部分和我国少数民族史有关。在每一个朝代，少数民族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少数民族又曾在西方建立过较大的帝国，与西方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只记载下来了这些少数民族在东方活动的一面，其在西方活动的一面还要凭借西方历史学家们的著述。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斟酌人名、地名的准确译音，但到最后还是感到不满意，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草原帝国》一书，大约有二千五百多个人名、地名，其中有的是属于欧洲的，有的是属于亚洲西部、中亚细亚和印度的，有的是属于我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现在，大部分的译音已渐归于统一，还有少量的译音是随著者不同而有异。用欧洲文字翻译东方各国人名、地名时，不但会因字母不同而产生变异，即在同一文字中同一东方名字也有不同的拼音。所以，译音的不统一是不足为奇的。在古代地理名词中，常有因时代的不同而译为不同的名字的。何况，地名往往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变更。

过去，学者们对《元史》感到不满意，其名词的前后不一致实为大病之一。清代史学界致力于《元史》的改造者不乏其

人，对该书中存在的人名和地名译音尤多方加以考证。然汉文译音若无其他文字拼音与之对照，则仍不能臻至善之境。1781年，乾隆帝敕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满文字母将三史内非汉语名词的译音一一拼出，因而明朗化了不少专门名词的译音来源和原文意义。

当然，在各民族语言中，有习惯以某些特殊称谓作为人的命名，因而会出现一些人名相同的历史人物。清代史学家魏源（1794—1856）在他的《元史新编》里作了一个蒙古人名的统计，说在“元史”里有124人叫作帖木儿，15个人叫作脱脱，10个叫作不花，9个人叫做伯颜。所以，在遇到两个以上同名的历史人物时就不免会发生混淆。在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帖木儿帝国的创始人帖木儿，这个名字极通用于突厥和蒙古人中间。为了把他和其他的帖木儿加以区别，本书著者格鲁塞采用了他的讹名达米尔兰（Tamerlan，来自Timour Lenk）。但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鉴于《明史》曾屡次提到他的原名“帖木儿”，我们也就遵循了这个传统的译法。

在旧元史学中，译名约有四种来源：魏源、洪钧、柯劭忞等多本自《亲征录》；屠寄则多本自《蒙古秘史》；宋濂等编纂的旧《元史》和修改了旧《元史》译音的清朝乾隆版殿本《元史》。四者译音有时区别很大，我们采用了其中比较通用而与蒙古语原音又甚相近者。

地名译音对历史学的重要性并不下于人名译音。所以洪钧在他的《元史译文证补·西域古地考》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二卷，屠寄在他的《蒙兀儿史记》里有“西北三藩地通释”一卷，施世杰还专门为《蒙古秘史》作了“山川地名考”十二卷，丁谦作了“地名考证”十五卷。清代

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与近人冯承钧氏的《西域地名》是研究中亚细亚古代地名的很好参考书。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外国地名尽量采用现在通行的译名，如克鲁伦河而非《元史》上的怯绿连河或胘朐河，鄂嫩河又非《秘史》上的韩难河。如果古今名称不同而原著者有意识地写作古代名称时，我们则以汉文古史中的译名代之，例如阿姆河是现代名称，而乌浒河则为古代名称。在中亚细亚还有许多古代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我们当采用古代历史上的译名。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乌浒河外地”的名称问题，原著者以“乌浒河外地”代替“索格底安那”，但有时也偶然提到这后一名称。这两个名称都很古老。前者出自古希腊地理书，译文为乌浒河以外地方。据希腊学者解释，该地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全部地区，即相当于西辽所建“河中府”辖地。波斯地理学者所称“索格底安那”则只限于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至于索格底安那是否即是中国古史上的康居、粟特、粟弋和贵霜匿等，其地理范围是否相同，则东西方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格鲁塞的采用Transoxiane，而非Sogdiane，似亦有意在避免地理名词上的误会。译者将该名称直译其意而不译其音，所以避免给读者以生殊之感耳。

由于《草原帝国》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蒙古帝国史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概括地介绍一下关于蒙古帝国的中外史料和史学家们的专门论著。

蒙古帝国开创时的原始史料在中国所传者为《蒙古秘史》与《皇元圣武亲征录》二种，在西方所传者为《金册》，其实，三书同出一源，即《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此书原本为回纥字

蒙文，在成吉思汗生时已撰修十卷，后于1240年又续二卷。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将它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在这以前六七年间，元仁宗曾诏令察罕译《脱必赤颜》的一种修正本为《圣武开天记》，即《圣武亲征录》的前身。清代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自《永乐大典》中钞出汉字蒙音与汉语对照的《元朝秘史》，实为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因直至该时，《秘史》藏于禁中不传于外。其后李文田（1834—1895）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该书作了笺注。《圣武亲征录》一卷亦为钱大昕自《四库提要》所钞出者，后经张穆（1805—1849）与何秋涛（1824—1862）二人详加校讎。

《元朝秘史》于1866年为俄国传教士帕雷底阿斯（1817—1879）（译为俄文，书名改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传说》）。该传教士又于1877年将《皇元圣武亲征录》译出，书名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此后，即未闻该书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译本。直至1941年，苏联始出版了郭增的新译本，书名为《秘史，1940年作的蒙古编年史》。1947年，蒙古达木丁苏伦出版了蒙古文的《蒙古秘史》。1948年，德国海涅士出版了德译本《蒙古秘史》。

《金册》是较《秘史》晚出的译本。《秘史》直接译自“脱必赤颜”的原始本。《金册》所根据的修本则凡稍涉皇帝忌讳者皆删除之。可惜，这部藏于秘室和由大臣守护的“金匱副本”早已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就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以窥测《金册》的内容之一斑。

拉施特哀丁于1310—1311年间写成《史集》，共分四编：第一编题名献给合赞汗的历史，除序文外包括突厥及蒙古诸族的历史、区分、谱系、家系、口碑等；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其

先世及后代的历史，在中国止于铁木耳（成宗）朝，即1294年，在波斯止于合赞汗朝，即1304年；第三编记载古代西方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及伊斯兰教以前的波斯古代诸王史；第四编内容更为丰富，自穆罕默德创教至1258年蒙古人讨灭哈里发王朝，并涉及中国、印度、法兰克人、基督教与佛教历史。《史集》于1836年由法国嘉特迈尔译为法文，唯只出版了第一册，题名《拉施特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蒙古史》。该书内容有导言84页，序论146页，译文与原文合璧计423页，但仅包括旭烈兀汗一朝政事。俄国贝勒津于1858、1861、1865、1888年陆续发表了俄文译本，即《编年史集蒙古史》（见《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报告》第5、7、13、15卷内）。但其所译亦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即《突厥与蒙古部族考》与《成吉思汗本纪》二章。该译本1946年由苏联科学院再版；1952年又有斯米尔诺娃的俄文新译本出版（仅为《史集》第一册）。《史集》的其他部分的外文翻译有：哈木耳——普尔斯达耳的德文译“中国”一章，克拉普罗特的法文译“中国”一章，哀特曼的德文译《突厥·鞑靼及蒙古部族考》，1841年加安的法文译本《法兰克人史》。就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作总括的研究者，应首推法国布洛舍。他于1910年出版了《拉施特史集导论》（1910年荷兰莱顿版）。除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外，关于蒙古帝国的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书尚有《世界征服者史》、《瓦萨夫书》、《史记全编》与“扎阑丁算端传”。

在汉文典籍中，除《蒙古秘史》与《皇元圣征录》外，关于蒙古帝国创立时的史料还有彭大雅与徐霆合著的《黑鞑事略》，孟拱的《蒙鞑备录》，和陶宗仪的《辍耕录》。《元史》当然是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它是由宋濂、王祚等共同编修

的。《元史》所根据的主要是于洪武二年（1369）获得的《元十三朝实录》与《经世大典》，其顺帝一朝因无实录，遂由欧阳佑等在北平采访遗事以补充之。在编修过程中，二次开局，前后不过十四个月，仓促成书，舛驳罅漏在所不免，计本纪4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97卷。当时人如顾炎武、朱彝尊、徐一夔等即对其加以非议，谓其事迹不详，体例不合，文字不校。然《元史》仍不失为一部史料丰富的大型著作，它可与波斯拉施特哀丁的《史集》相映辉。西方学者对《元史》的研究亦为时甚早。法国汉学家宋君荣（1689—1759）于1739年出版《元史》的部分翻译：《成吉思汗及中国的蒙古诸王史》。俄国东方学者夏真特（1777—1853）于1829年自《元史》译出《蒙古最初四汗史》。

将纪传体《元史》改编为其他类型史书者有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4卷）与邵远平的《元史类编》（42卷）。其后，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是纯粹对《元史》的考据学。清中叶后，魏源（1794—1856）著《元史新编》（95卷），曾廉著《元书》（102卷），二者皆有倾向超出元朝一代史的范围，但史料仍局限于汉文典籍。清季，洪钧（1840—1893）自西文译出有关蒙古帝国史文献若干篇，题名《元史译文证补》（虚目30卷，实存20卷），所以证汉文史料所未确者，与亦中国所未闻者。于是《元史》研究者始知其国外有大宗与蒙古帝国有关的史料。洪钧列举其所参考《西域书目》于卷首，其实他并未直接参考所列各书，其所译者大部出自俄、法、英、德文著作。按洪钧出使欧洲时在1887—1890年间，至俄国后即获得拉施特哀丁原著，但不能通晓，后多方购求多桑著作不可得，乃先自英人霍渥尔斯与德人